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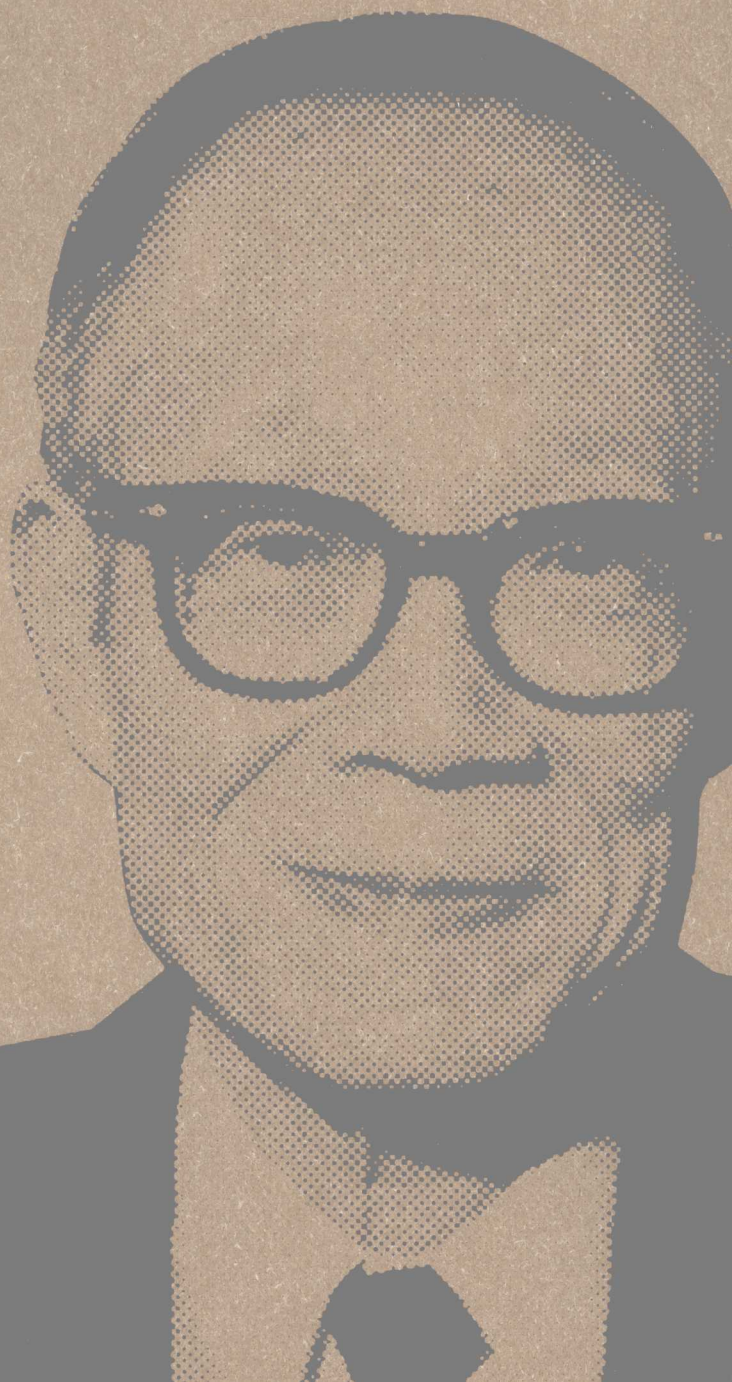
谁料当年日本通 竟成股市操盘手



高宗武

隐居华盛顿遗事

夏侯叙五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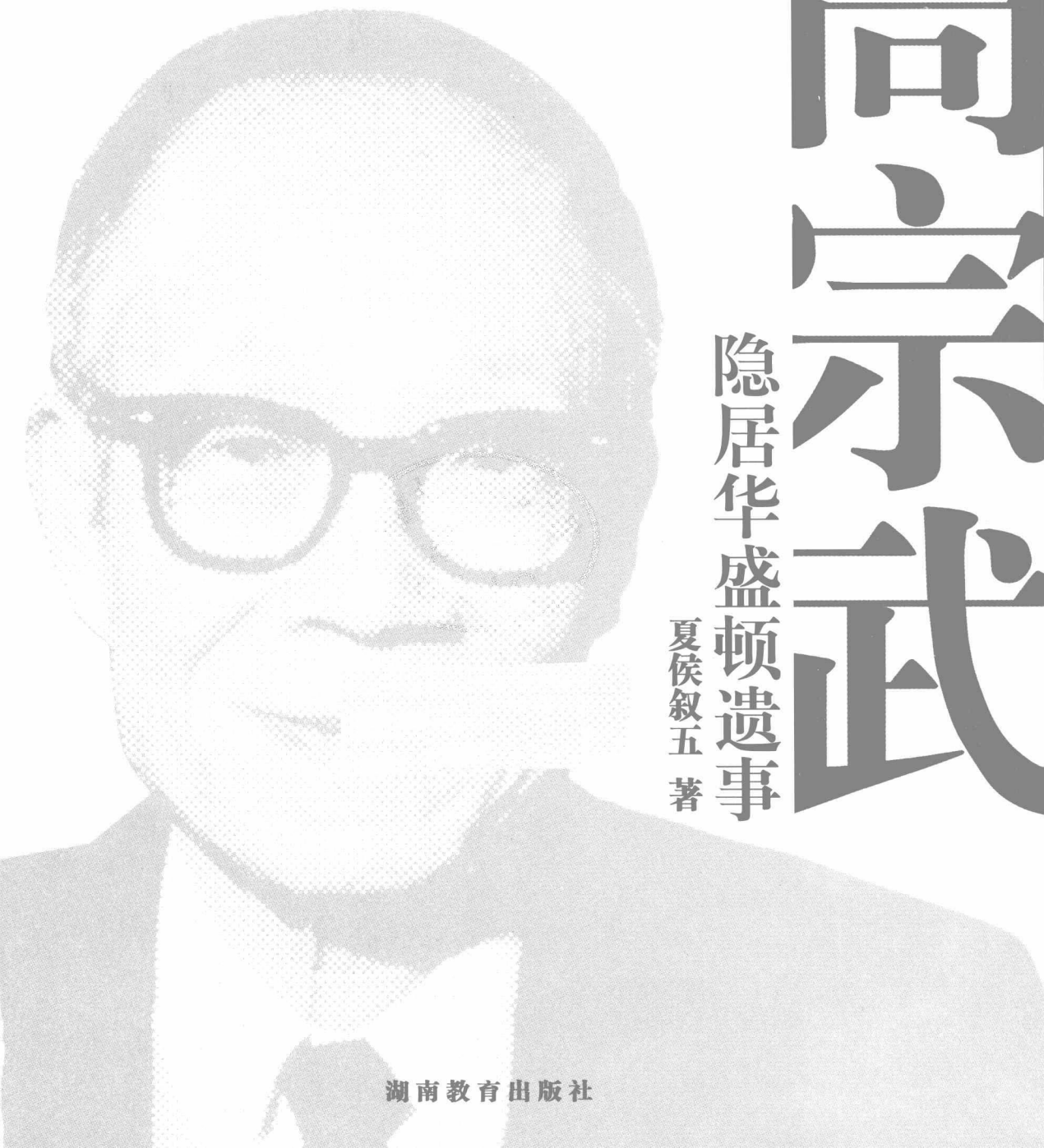
谁料当年日本通 竟成股市操盘手



高立武

隐居华盛顿遗事

夏侯叙五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 / 《书屋》杂志社编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12

(书屋文丛)

ISBN 978 - 7 - 5355 - 5870 - 1

I. 高… II. 书… III. 高宗武(1906~1994)—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6116 号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

夏侯叙五 著

责任编辑:胡长明

责任校对:胡长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718 × 1000 16开 印张:17 字数:183 500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978 - 7 - 5355 - 5870 - 1

G·5865

定价:32.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一书业已编辑完毕,准备出版。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我愿就该书的缘起、内容、价值、局限性以及其他应当说明的事宜做些交代,以方便读者阅读和参考。

(一)高宗武生平活动简历

本书介绍的主角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人。1921年从温州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其先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他关于中日外交问题的博士论文的片断就曾在中国数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1931年结束学业归国后,在首都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被刺身亡,史称“五·一五



事件”。针对这一事件，高宗武写了一篇约六百字的短文《日本之法西斯蒂运动》投给南京《中央日报》，引起报社高层的兴趣和关注，随即被聘为《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相继发表《日本法西斯运动发生之原因及将来》、《日本新内阁的人物(一)——总理大臣斋藤实》等文章，一时名声大噪。蒋介石很欣赏他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特意邀其长谈。

1932年11月，高宗武离开《中央日报》社，转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的研究工作。1933年，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看过高宗武的文章后，对其能力大为赏识，力邀其加入外交部工作。1934年初，高宗武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并很快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1934年5月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升为亚洲司副司长，1935年又擢升为亚洲司司长，这时他还不满三十岁。

从1934年到1937年，高宗武作为外交界的新锐，在汪精卫、张群、王宠惠等几任外交部长门下皆得到重用，蒋介石亦将其视为肱股之臣，屡屡单独召见，向其征询对日外交战略。在此期间，他是中国对日交涉的主要谈判人员，举凡与伪“满洲国”的通邮事件、应对日本对中国的“船津工作”等等，他都亲与其事，折冲樽俎不遗余力，期间还曾到日本和伪满洲国考察。1938年初，高宗武征得蒋介石同意后赴香港，表面上以“宗记洋行”名义办理商务，暗中则操纵隶属国民党宣传部的“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利用其中的“日本问题研究所”，代蒋介石负担对日联络与觅取情报的工作，其活动经费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领取，每月两千美元。2月中旬，高宗武指派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秘密赴日本，“刺探敌国大本营最高当局对华真实态度”。该年6月，高宗

武亲自潜赴日本，会见日本近卫文麿、板垣征四郎等政界和军界人士，并将谈判结果呈报蒋介石。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高宗武与汪精卫的关系日趋紧密，之后偕同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影佐祯昭在上海重光堂谈判，秘密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等投降卖国文件，这些文件对汪精卫投敌产生了重要影响。“重光堂协议”签署后，高宗武追随汪精卫投敌，推动所谓“和平运动”，但心情也变得矛盾和沉重，特别是1939年2月东京之行后，他“深信日本人不诚实”，不愿汪精卫走得太远。1939年3月31日，汪精卫秘书曾仲鸣在河内被刺后，高宗武多次劝说汪精卫前往欧洲或菲律宾，并反复提醒汪精卫不能轻信日本人。1939年5月汪精卫赴上海前，其阵营已形成所谓“高宗武路线”和“周佛海路线”。高宗武坚持不在沦陷区建立新政府，而周佛海则坚持依靠日本在南京建立政权。高宗武心绪低落，而日本人也开始对他产生怀疑。1939年6月，汪精卫由上海飞东京，高宗武、周佛海、梅思平等陪同前往。1939年11月，汪精卫、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上海愚园路汪精卫公馆内集会，研究日方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简称《日汪密约》。之后高宗武下定脱离汪精卫投降阵营的决心，他巧妙取得《日汪密约》的内容，在杜月笙的掩护下潜赴香港，并于1940年1月21日与陶希圣联名将《日汪密约》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揭露日本侵华的狰狞面目和汪精卫投敌卖国的无耻行径，脱离汪精卫集团。史称“高陶事件”。

“高陶事件”发生后，蒋介石颇感欣慰，他让杜月笙转交一封给高宗武的亲笔信，说高宗武“今后如愿返渝作研究工作亦可，不过，依愚见，最好渡美考察”。高宗武心领神会，表示遵命赴美“考察”。1940年3



月8日,化名“高其昌”的高宗武,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的名义,偕夫人沈惟瑜离开香港,辗转于1940年5月21日抵达美国纽约。29日,在中国驻美大使胡适的安排下,高宗武夫妇赴华盛顿,入住康涅狄克花园415号,两年后搬至Kalorama 1915号。上世纪六十年代又迁居Van ness公寓。从1940年5月到达华盛顿,高宗武在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在简单中求安定,在苦闷中求清静”的隐居生活。高初到美国,陈布雷电告胡适大使,转告蒋介石的指示,要对高宗武“多予照拂并维护”。从1941年至1944年,高每年均收到蒋介石特批的生活补助费,少则四千美金,多则四千八百美金。

高宗武初到美国,以写回忆录为主,1943年写成《日本真相》一书(英文译稿名称为《深入虎穴》, *Into the Tiger's Den*)。高宗武写作此书的初衷是将自己对日交涉的经验及对日本政情、社会的认识传递给美国人民,以期对美国战胜日本有所助益。但后来因为时局巨变,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该书价值大打折扣,所以虽几经周折而未能付梓,以致这部书稿尘封六十多年后才被发现。后来迫于生计,高宗武在美国做股票生意,因为深入研究美国市场行情而收获颇丰。

高宗武的人生宛如旋升旋落的一颗流星。不到而立之年的他春风得意,在外交舞台上出尽风头,却不曾想到那种天地同力的感觉,不旋踵便随风而散,由站立时代潮头一下子变为寂寞独守,饱尝“久病精神减,长闲意气消”的滋味。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大梦大醒、大喜大悲,高宗武还能活到望九之龄,也算是个奇迹了。

高宗武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关系都相当复杂,他一生的命运也与这两位政治人物密切相关。高与蒋是同乡,蒋一度相当器重他的才华,并有

意安排其在侍从室工作。高也认为蒋对其有知遇之恩,因此给蒋写信,常说“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之类的话。另一方面,高宗武也深感汪精卫有恩于他,汪精卫曾是他与沈惟瑜的证婚人,1938年底南京撤退时,一张船票难求,又是汪精卫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这些私交又使他对汪精卫颇有好感。加之他那时年轻气盛,认为自己精通日本政情,总想在中日交涉时做出一番事来,因此追随汪越陷越深,以致酿成大祸。在蒋、汪之间的进退失据,让高宗武充分领略了政治的险恶莫测。

高宗武身陷困局之时悬崖勒马,固然不失明智之举,但毕竟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著名学者傅斯年听说高宗武到美国后受到胡适的热情款待而怒不可遏,对高宗武破口大骂,甚至认为“汪逆之至于此,皆高丑拉拢也”。虽说有些过头,但高宗武的历史污点无论如何是不能洗刷掉的。

身处乱世的高宗武“上船容易下船难”,不经意间就成了政治棋盘上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蒋介石是深谙权术之人,高宗武的许多行为或许不无蒋的默许,但一旦走得太远就将代人受过。而汪精卫又是反复无常之徒,一遇时局艰困便意志动摇,做事无底线、无原则。所以经历了政潮的狂风恶浪后,高宗武多次对人说,政治是太危险了。

蒋介石对高宗武的态度特别耐人寻味。本来高宗武与陶希圣同属“反正”之人,而陶希圣后来得到重用,而高宗武却只能远走他乡,可见高宗武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蒋对他不再重用,但也没有完全抛弃他。高宗武在美国初期,便不时得到蒋的关照和接济。种种迹象表明,高、蒋关系之复杂不亚于高之与汪。高宗武在美国几十年,始终奉行低调做人的原则,



包括唐德刚在内的诸多史家，想尽千方百计欲从高宗武口中套出真相，但却总是无功而返。高宗武曾对日常过访的晚辈季蕉森（其父为高宗武的小学同学）说过：“说真话对不起朋友，说假话对不起自己。”其左右为难之情，当可想见。

（二）写作背景及主要内容

本书由安徽省蚌埠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侯鸿绪（笔名“夏侯叙五”）先生所编写。侯先生出身书香门弟，曾长期致力于民国史的研究。其兄侯鸿飞先生为中国地质大学教授，而高宗武的孙子高昕（现居美国）正是侯鸿飞先生的女婿。高昕手头保存有大量关于民国外交风云人物高宗武的史料，曾与岳父多次详谈这些史料的价值。侯鸿飞先生于是多次往返于北京与纽约之间，将近千页的文字和照片资料拍摄、复印出来。他本来有意亲自动手整理这批资料，而且书名都拟好了，名之曰《高宗武与胡适》。但侯鸿飞先生是大忙人，他不仅要教书育人，还担任着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主办的 Episodes 杂志的执行主编，除审稿外，还要实地勘察，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在海外。鉴于手头公务繁忙，无暇顾及此事，于是将整理、注释这批资料的任务全权交与其弟侯鸿绪先生。侯鸿绪先生又正是文史方面的积学之士，其热情、学识和文字功底足以担当此重任。

侯鸿绪先生积数年爬罗剔抉之劳，详细研究了这批史料，包括高宗武与国民党要人蒋介石、陈立夫、张群、何应钦、张嘉璈、陈布雷、胡适、杜月笙、陶希圣等的大量往来书信，最后确定体例，拟定目录，分门

别类地提炼和归纳史料，撰成《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一书，重点介绍高宗武 1940 年到 1994 年在华盛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隐居生活，又适当追溯了他在隐居华盛顿之前的复杂经历和心曲，并配以近百幅珍贵图片和书信手迹。但书编写完毕时，侯鸿绪先生却惴惴不安起来。高宗武可是个复杂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写这样一本书，会不会有人“拿着框框和棒子找毛病”？因心有余悸，他只好无奈地将好不容易编成的书稿搁置案头。

说来也巧。正当侯鸿绪先生左右为难之际，他偶尔看到了《书屋》杂志 2006 年第 2 期登载的一篇文章，题为《从政七年如咯血——高宗武旧事》，便如获至宝地翻开细读。虽然他认为该文有诸多可商榷之处，但此文的刊出无疑增加了他出版书稿的信心。所以他很快与《书屋》取得联系。我和《书屋》主编聂乐和先生认为，这是一部对研究民国史颇有价值的书稿，于是先后赴蚌埠与侯先生面谈，确定先期在《书屋》杂志上连载，然后列入“《书屋》文丛”出版。

本书的内容以人事交往和历史事件为单元而展开，以高宗武 1940 年“奉蒋介石之命赴美考察”开篇，以高宗武“病逝华盛顿家中”终篇，一共三十余篇，中间披露了高宗武在华盛顿隐居期间的主要活动、主要的人物交往，包括他在美国初期撰写《日本真相》的过程和出版时的一波三折，以及后来迫于生计在美国做股票生意的趣事。为方便读者了解真实的高宗武，本书也详述了高在赴美之前追随汪精卫参与对日“和谈”和脱离汪精卫的情况。通过大量珍贵的史料，该书如笋剥壳般地将“谜”一样的历史人物高宗武向真实还原，读来颇有让人豁然开朗之感。



(三)本书的价值及局限性

《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一书有多方面的价值,而最重要的则在于史料价值,许多史料特别是高宗武与国民党要人的往来书信系首次披露。凭借这些扎实的史料,该书有助于解开许多历史谜团,澄清学界研究高宗武及民国历史中的一些模糊和不实之词,兹举数例:

一、高宗武是如何取得《日汪密约》拿到香港发表的。

《日汪密约》即《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是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的纲领性文件,其罪恶无耻比之民国初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有过之而无不及。1940年1月21日,高宗武与陶希圣将《日汪密约》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一时震惊了海内外,史称“高陶事件”。汪精卫集团内部乱作一团,周佛海恨恨地说:“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但他们究竟是如何取得这份密约的,学界却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高宗武从汪精卫手中“借回家”的,有的说是高宗武、陶希圣“盗走”的。事情的真相是,当时参与谈判的日方代表之一的影佐祯昭认为草案汉译文字不甚通达,汪精卫于是要高宗武在他那儿着手修改。凑巧有一天日本议员小畑薰良来南京见汪精卫,高宗武奉命作陪,并随手把密件和译文随身带上去参加会见。会见结束后,高宗武利用送客至旅馆的机会,将密件交与夫人沈惟瑜拍照,并由沈惟瑜的哥哥沈惟泰在自家的小暗房冲洗成胶片,后来高宗武才携密约胶片潜赴香港发表。

二、1938年夏高宗武赴日本时蒋介石是否完全不知情?

1938年7月2日,高宗武在日本特工人员松本重治和伊藤芳男陪同

下,从上海乘轮船密赴日本,先后会见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国会议员犬养健以及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日本军政要人。日本方面带倾向性的观点是日本助汪精卫上台,促蒋下台,以汪而代蒋。返回香港后,高宗武将自己在日本期间的日记和会谈记录等件,派助手周隆庠送武汉交周佛海呈蒋介石。蒋将高宗武的报告放置案头达三日之久,弄清了日本决不以其为外交对手的真实意图。高宗武秘密赴日一事被曝光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后来许多著作,如陶恒生的《“高陶事件”始末》、龚德柏的《汪兆铭降敌卖国密史》,也都认定高宗武此次东京之行是瞒着蒋介石的个人行动,蒋完全不知情。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该书援引了高宗武后来给一位朋友的书信手迹,其中说,1938年初夏,“弟告蒋云:我之目前行动,到处受人注目,可否容我辞职,以私人资格奔走和平,成则政府可以采用,不成则与政府无涉……我之一切言行,即签了字,对政府无约束力,政府不负任何责任。蒋即同意。此弟辞职之由来也。”据该书介绍,陈璧君的侄儿陈春圃在后来题为《汪精卫投敌内幕》的交代材料中,记述1938年12月他在香港晤见高宗武时,高亲口对他说过:“在汉口蒋介石召见我,示意我想尽方法试探东京方面媾和条件,并且关照我可向外交部请病假,先期赴香港,以在香港疗养为名伺机东渡,但要绝对保密。”另该书还征引了美国学者邦克在《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一书中的一段话:“高曾通过陈布雷向蒋报告他准备去日本的计划,蒋照例不置可否。”揣摩上述史料,无论是蒋“同意”、“示意”抑或“不置可否”,蒋对高宗武当时的心态和大致活动计划是知道一些的,说高宗武赴日本是背着蒋干的,蒋完全不知情,



不一定是历史的真实面貌，而且很可能恰恰相反。高宗武由日本回来后致蒋信中所说的“擅越之罪”，或许是不得已的违心之言，实则代人受过。而何以高宗武不亲自将报告呈送蒋介石，而是找人转交，也并非恐遭蒋氏责难，而是高宗武考虑到“此行返港，又复飞汉，深恐引人注目”之故。

三、高宗武移居美国后是否还见到过蒋介石？

台湾《传记文学》上曾发表周谷先生《高宗武笑谈当年事》，谈及1967年高宗武的台湾之行时说：“高游台北时，拟请见昔日蒋委员长未果。高说蒋委员长不方便接见旧日常见的僚属。”著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唐德刚先生也曾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发表《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汪精卫投敌始末》，称1938年夏高宗武赴日后，高、蒋“二人以后也就一辈子没有再见了”。这种观点后来以讹传讹，误导了許多人，就连2006年第2期《书屋》发表的范泓先生《从政七年如咯血——高宗武旧事》一文也持此说。

实际上，1967年高宗武赴台湾时确实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这有当时蒋介石、宋美龄的请柬以及高宗武8月12日的日记为证。日记云：“余赴中山堂应‘蒋总统’及夫人茶会，严‘副总统’、孙哲生、蒋经国、陈立夫等新旧要人，皆在那边。陈立夫替余介绍严家淦及蒋经国两位，因为余与他们第一次见面之故也。”又云：“今日之会余为最后告辞者，三十年未见，蒋之精神大致如旧，亦不为易。余谢他过去之照拂，他谢余来看他。”蒋介石亲自接见高宗武，从一个侧面表明，他们两人过去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甚至不排除高宗武当年充任重庆“秘密角色”之可能。

该书的史料价值当然远不止这些。书中披露的高宗武与当时显要的往来书信，有助于读者进一步领略胡适、陈布雷、杜月笙、陶希圣

等的性格和为人。胡适堪称高宗武的终身知己，他曾为高宗武著《日本真相》一书的出版而多方奔走，至于他托高宗武炒股票一事，尤足显示他为人处事的风范。陈布雷、杜月笙长期充当高宗武与蒋介石之间的信使和中介，而杜月笙秘书胡叙五致高宗武之信，则透露了陈布雷之死的真实原因。陶希圣与高宗武曾在历史巨浪中同沉浮，往来书信写尽了乱世的悲苦和离情，两人阔别二十余年后在华盛顿重逢，回首前尘不胜唏嘘。

《遗事》一书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高宗武一生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共的，他与朋友之间的言论和书信不乏反共色彩，而对蒋介石及国民党则多有赞颂和同情之词。如1946年4月2日，高宗武致信蒋介石，就政府向美国借款的方法问题披陈己见，并为当时美国舆论为左派把持深为不满，表白自己“静居海外，不识时事，惟深感钧座十余年来栽培爱护，无微不至，故在此国家安危兴废之时，目有所见，耳有所闻，似不能不本我天良，谨陈钧座。”又如1947年11月，高宗武致信民国政府行政院长张群，为内战中的国民党争取美援出谋划策，说“欲使借款早日成功，必须使美国舆论对政府加以强大之压力，否则在目前情形之下，不但借款遥遥无期，即一旦成功，其条件亦必可观。武历数日来之静思默考，深感我政府有即日更换驻美使节之必要，其人选似以向不作官，生活平民化、社交民主化，在中国社会有地位而兼有高尚之人格者为最相宜。”再如朝鲜战争爆发后，高宗武致信何应钦，邀请他去美国众议院之反共委员会作反共宣传，说“先生倘能本过去二十年来反共之经验，与该委员会一谈，不但美国议员获益不浅，同时亦可为‘我国’反共宣传之大助，其效力必优胜于报馆作文章或当众演说也。”这些言论当然是我们反对的，敬希读者明鉴。



(四) 出版宗旨和编辑处理原则

我们出版这本书的宗旨是为民国史特别是民国重要人物的思想生平的研究,提供一部真实的有丰富史料的书稿。高宗武在民国政坛上虽然算不上大人物,但也曾一度风云际会,被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他是当时有名的“日本通”,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被蒋介石、汪精卫倚为肱股之臣,参与了一系列的中日交涉活动,知晓其中的许多内幕;他交游广泛,与当时政坛要员如蒋介石、陈立夫、胡适等相知甚深;加之他到美国后也并未真正隐居,而是与国内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将其“隐居”生活及以前的政治活动有条理地披露出来,无疑会对研究民国的政坛风云有所助益。

在编辑处理原则上,我们一是本着存信史,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资料的愿望,对重要史料均按原件录出,基本上保留原貌。当中的是非曲直,由读者分析和鉴别;二是引用 1949 年后台湾当局原文或涉及台湾当局官方称谓、机构和官职名称,如“中华民国”、“外交部”、“立法院”等时均加引号,确保涉台用语的规范使用;三是详作注解,特别是涉及信件手稿时,力求对一般读者不大熟悉的人名、事件和背景进行注解,以便读者阅读和参考。

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学识水平有限,书中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妥和不足之处,敬希读者诸君鉴谅!

胡长明

2008 年 10 月 5 日

忆高宗武伯伯

代序言

◎
季蕉森

1959年我从台湾来美留学，学成就业后，于1971年间替父亲（讳崇仁，1906—2003）与母亲（1906—1978）办妥来美移民的手续。1972年初夏，接双亲来我家（在Rockville, Maryland）住，那时我已成家，是两个女儿的爸爸。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我当年在温州模范高小读书时，有一位很要好的同学，他的姓名是高敏，我的学名是杰，是我们同乡温州乐清人，我俩同岁数，都住校，共膳宿有五个学期，彼此均系校内的高材生。他的国文成绩特别优异，我两人那时的情谊相当好。自从离开学校以后，各奔前程，五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跟他再见过面。”接着又说：“我知道有一位名人高宗武先生，也是乐清人，在我国对日抗战初期，他就来了美国，



不晓得我的同学高敏与这位高宗武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的话，不知他是否住在华盛顿附近？你能不能替我去‘驻美大使馆’查问一下？”

同周的星期六上午，我去“驻美大使馆”为父亲查问这件事。它位于2311 Massachusetts Ave., N.W., Washington, DC，现在是海地共和国的驻美大使馆。那时候(1972)“大使馆”的接待员(Receptionist)是吴锦心女士。她是《中央日报》名记者汪有序先生的夫人，亦是我们温州老乡。汪夫人知道我的来意之后，对我说：“我不但认得高宗武先生夫妇，而且还很熟，他们就住在华府，我可以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你，请令尊直接去电话问，看看高敏是不是就是高宗武。”于是，当晚我替父亲先拨高府的电话，接通后，知道对方是高宗武先生，我就立即让父亲把电话接过去与对方讲话；父亲开头就说：“喂，我是从前温州模范高小的季杰，请问高先生是不是就是高敏？”我虽听不到对方讲话的声音，但从父亲当时讲话那一刻喜悦的表情，可以判断出“高宗武就是高敏，同一个人”。就这样，我替父亲找到了他失去联系半个多世纪的一位高小老同学，我为此亦很兴奋。然后，不久由我陪同父亲于约定的日期与时间，前往高府(3001 Veazey Terrace, N.W. Apt. 711, Washington, DC)拜访。高伯伯与高伯母那天俩人亲自在大厅门口等候，迎接我父亲。高伯母姓沈，名惟瑜，江苏嘉定人。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是卅四年以前的事了，不过还得要感谢汪夫人当年的帮忙。

高伯伯一生从来没有驾驶过汽车，高伯母早年在美国虽曾有过驾驶执照，但亦从不开车。所以，父亲生前邀请高伯伯与高伯母来我家相聚时，是由我驾车去高府接送。记得他们第一次请我双亲吃饭是在华府十三街的北京楼餐馆，它是当年华府一家有名的餐馆，现在早已不存在了。